

萧齐诸帝的道教信仰 与“宝卷”的早期含义*

刘正平

以日本泽田瑞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宝卷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的科仪、忏法体裁及演出法，由此发展而来，中国学者刘祜等人对此观点进行了切实可信的论证。“宝卷”一词最早出现在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名字之中，其由来及含义根源于萧鸾、萧宝卷父子的道教信仰，特别是其对原始巫教和道教灵宝斋法的符咒、厌胜之术的佞信。因此，其“宝卷”一词的早期含义即指道教此类经卷而言。经过梁武帝《慈悲道场忏法》的定型，宝卷即作为道教、佛教经忏、科仪类文献通称。因此，宝卷在历史文献中是一直存在的，并不存在“断裂”的问题，只不过因为东昏失德，“宝卷”作为文献通称沉寂了几百年。“宝卷”文献名称的发明权应该归功于萧鸾、萧宝卷父子。

关键词：萧宝卷 宝卷 道教

作者 刘正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宝卷的研究中，一个困惑至今的问题是，宝卷究竟从何而来？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其关键问题是缺乏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支撑宝卷形成的各个阶段。郑振铎关于“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①的论断被学界广泛接受。车锡伦在《中国宝卷研究》一书中认为，“宝卷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俗讲”，同时也承认，“宝卷的产生，从历史文献中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②这是宝卷研究界的普遍看法，概括起来讲，认为宝卷的产生有两个主导性因素，一是受唐代变文影响，二是跟佛教关系密切。这个观点实际上跟目前存世的宝卷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特别是对教派宝卷的渊源解释力不足。因此，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

日本宝卷研究专家泽田瑞穗认为，“与其说宝卷继承数百年前业已消失了的变文，倒不如说宝卷直接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经过各个时代平行地传承并制作的科仪、忏法体裁及其演出法，进而将它改造成面向大众或加进某一宗门的教义，插入南北曲调，增加音乐歌曲性。其演出就是所谓的‘宣卷’。”^③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和思路，对探索宝卷的源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刘祜在《中国目连文化》一书中借鉴了泽田瑞穗的说法，并以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的《佛说目连救母经》和《慈悲道场目连报本忏法》为例，论述了其演化为现存最早的宝卷之一、北元时期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史”（18ZDA232）、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中国古代经坊研究”（19VJX090）阶段性成果。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79页。原文云“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

② 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第一章“宝卷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③ [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二卷，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的过程，指出其对目连宝卷形成的意义，认为文学性的宝卷是由宗教性的忏法演变而来的。“《升天宝卷》的形成过程说明，宝卷是宗教忏法、科仪与文学（韵文）结合、俗化而直接产生的。”^①认为宝卷来自于宗教忏法、科仪，无疑是极具创见，而且可能更符合事实。车锡伦在分析南宋释宗镜编写的《金刚科仪》的形式特征的时候，也指出“从这部‘科仪’的形式上看，它是佛教‘忏法’和俗讲‘讲经’相结合的产物。”^②上述观点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认为宝卷来自于中土所造宗教忏法、科仪类文献，并经文学化改造和世俗化演变形成，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论基础。^③

学界公认，最早的忏法是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二年（503）为亡夫人郗氏忏悔罪业的《慈悲道场忏法》，又叫《梁皇忏》。《释氏稽古略》卷二载：

梁帝（梁武帝）初为雍州刺史时，夫人郗氏性酷妒，既亡，至是化为巨蟒入后宫，通梦于帝求拯拔，帝阅佛经为制《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忏礼。夫人化为天人，空中谢帝而去。其《忏法》行于世，曰《梁皇忏》。^④

人们普遍认为，《慈悲道场忏法》是佛教忏法，佛教史料的记载也显示，梁武帝似乎是根据佛经制订了这部忏法。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说“忏之始，本自南齐竟陵王，因夜梦往东方普光王如来所，听彼如来说法后，因述忏悔之言。觉后即宾席，梁武、王融、谢朓、沈约共言其事，王因兹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忏悔》一篇。后梁武得位，思忏六根罪业，即将《忏悔》一篇，召真观法师慧式，遂广演其文，述引诸经而为之……即非是为郗后所作。”^⑤钱易认为梁武帝受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影响，将其《忏悔》等篇交由慧式创制了《慈悲道场忏法》，而且并非专为郗氏而做。萧子良是南齐皇室“弘法护教”的代表性人物，是南齐佛教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和设计者，作为“竟陵八友”文学集团的成员，萧衍深受佛教影响自是应有之义。但“影响研究”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新事物的出现很难归结断定为单一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关于《慈悲道场忏法》产生的渊源，我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其产生的宗教环境，以及南朝复杂的佛道竞争、融合关系和发展状况；二是梁武帝本人宗教信仰前后变迁的过程，以及《释氏稽古略》《南部新书》之类史料记载的可信度。这两个问题是关乎《慈悲道场忏法》之所以产生的根本性原因。

齐亡之后，曾属齐萧子良“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时任南朝梁太子中舍人的著名文学家陆倕，奉梁武帝萧衍命撰写《石阙铭》一首，历数东昏侯萧宝卷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状，赞扬萧衍吊民伐罪之功“于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极，把钩陈，翼百神，禔万福。于是龙飞黑水，虎步西河，雷动风驱，天行地止，命旅致屯云之应，登坛有降火之祥。龟筮协从，人祗响附，穿胸露顶之豪，箕坐椎髻之长，莫不援旗请奋，执锐争先。”^⑥文章主旨显露出深受道术影响的儒家天命神学风味，这应该是受当时宗教环境影响的产物。梁武帝颁布“舍事道法诏”，公开宣布放弃道教信仰，改宗佛教的具体时间和史料依据，在学术界向有争议。^⑦据柏俊才的最新研究，萧衍舍道事佛在大同七年（541），认为萧衍称帝之后，在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思

① 刘祜《中国目连文化》第八章“目连救母与宝卷的形成”第五节“‘经’、‘忏法’与宝卷的形成”，第214-217页。

② 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第28、29页。

③ 佛教科仪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由中国僧俗编集而成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关于佛教仪式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为侯冲《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但该著鲜少论及佛教仪式与道教之间的关系。

④（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二，李利安、崔峰《南北朝佛教编年》，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656页。

⑤（宋）钱易《南部新书》庚卷，黄寿成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04页。

⑥ 出自（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十六，中华书局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2012年，第2065页。

⑦ 关于《舍事道法诏》真伪和颁布时间问题的争议，参见李猛《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中华书局，2021年，前言第2页注释②。

考,并在儒、道、释三家中进行了抉择,最终选择了以佛治国。^①《石阙铭》撰写于天监七年(508),距离梁武帝正式放弃道教信仰奉佛尚有三十余年,而制于天监二年的《慈悲道场忏法》则相距更远,因此很难排除道教对梁武帝《慈悲道场忏法》的影响。事实上道教从来没有从梁武帝的宫廷和信仰生活中远离,其皇位是从信奉道教的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父子手中夺来的,而且梁武帝跟陶弘景等道士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元代觉岸《释氏稽古略》之类的佛教史籍,记载《慈悲道场忏法》产生的经过时,仅一句语焉不详的“帝阅佛经,为制《慈悲道场忏法》”,无法确指梁武帝究竟受到什么佛经的影响制定了这部忏法;^②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载明是受萧子良影响,但据上述可知,道教在梁武帝统治前期影响颇大。因此,《慈悲道场忏法》是在儒释道并行的环境中制定出来的,受到佛教、道教的双向影响而生。圣凯在《佛教忏悔观》里说:

从义理上说,佛教比道教丰富一些;但是,从科教礼仪来说,道教却比佛教丰富,所以,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道教的礼仪是必然的。佛教的忏文,从其向三世诸佛忏悔,祈求消灾灭罪、荐亡往生的观念上看,和道教的上章首过的动机是相同的。道教早在东汉之世,就已经采用向天、地、水三官上章首过的做法,把自己所犯的恶业,写于章纸上,向三官忏悔,祈求赦免。道教的玉录斋、涂炭斋、八节斋等更是以忏罪为主,因而佛教的忏法,当是受了道教上章首过的作法的启发。同时,如汉传佛教在佛事中有念文疏的仪式,这是吸收道教斋醮科仪的青词表文加以改造而来。^③

圣凯的这段论述,认为佛教的忏法及其仪式,从动机、作法、仪式等各方面,吸收了道教的上章首过、斋醮科仪等形式。这个论断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也能很好地解释梁武帝首创《慈悲道场忏法》的宗教渊源问题:其内容是佛教的,但动机和形式上当受到道教“上章首过”作法的影响和启发。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诸如《慈悲道场忏法》之类产生在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佛教忏法,是否可能与“宝卷”有关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南朝萧齐诸帝的道教信仰和东昏侯萧宝卷的名字里,探索一下答案。

一、齐明帝萧鸾诸子及萧宝卷的取名

南朝道教、佛教盛行,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南朝诸帝和宗室、臣僚的起名,深受道教和佛教影响,如王僧孺、王僧辩、萧摩诃等。其中,齐东昏侯萧宝卷(齐废帝)的名字引人注目,“宝卷”这个词成了东昏侯的名字。那么,这个“宝卷”的含义有没有特殊的含义?

萧宝卷本名“明贤”,字“智藏”,南朝齐第六任皇帝,齐明帝萧鸾次子。他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昏君,直追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所以依照“故事”被封为“东昏侯”。唐代李延寿评价说“东昏以‘卷’名,‘藏’以终之,其兆先征,盖亦天所命矣。”^④《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和帝中兴元年”云“乙卯,始祀于其上。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⑤胡三省注云“卷读曰捲。”按照李延寿和胡三省的理解,“卷”同“捲”,弯曲、卷曲的意思,讥其横征暴敛,搜刮无度,以至荒淫无道,自取灭亡。“藏”有隐匿、埋葬

① 柏俊才《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原因及其他》,《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② 关于萧衍《慈悲道场忏法》的研究,及其与梁武帝《东都发愿文》、萧子良《净住子净行法》“忏悔篇”的关系等,可参见侯冲、圣凯、纪志昌、曹凌和日本学者船山彻等人的成果。

③ 圣凯《佛教忏悔观》第四章“忏罪理念与忏法制作”之“忏法形成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④ 《南史》卷五“齐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页。

⑤ 《资治通鉴》第14册卷一四四“齐纪”“和帝中兴元年”,中华书局,2013年,第4648页。

的意思,言其命中注定,早有先兆。这种解释是根据萧宝卷统治的行为后果做出的道德评判,“卷”“捲”两字在魏晋以后已经分用,“卷”所具有的“弯曲”“卷曲”之意写作“捲”,因此胡三省等人的解读聊备一说,但依据不足。萧鸾共有十一子,长子萧宝义“有废疾,不堪出入人间”,^①且是庶出,没有皇位继承权。次子萧宝卷立为太子,颇受宽纵,萧鸾驾崩之前告诫萧宝卷,“作事不可在人后”。^②因此,萧鸾对萧宝卷的培养,是希望其能杀伐果断,重其武功,事在人先,以“卷藏”之意解之,不符合取名用意。那么比较合乎事理的解释,“宝”当为“法宝”之意,“卷”为“经卷”之意,这也能与“智藏”之字相呼应。“藏”作“经藏”理解,在南朝也渊源有自。南朝沈约在《佛记序》里说“博寻经藏,搜采注说,条别流分,各以类附。”^③沈约(441-513)生活在齐梁时期,正好是萧鸾、萧宝卷和萧衍的时代。萧宝卷的名和字取意于经藏,是可能的。能够支撑此说的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佐证是萧宝卷太子萧诵和遗腹子萧赞(“赞”繁体为“讚”),这种独特的起名方式,“诵赞宝卷”之意尤为明显。特别是萧赞,本名萧综,梁武帝次子,系东昏侯萧宝卷妃吴景晖所生。得知身世真相后,叛逃北魏,改名萧赞,为生父东昏侯举哀,并服丧三年。^④这个改名,是对“宝卷”本义最直接、最有力的诠释,萧宝卷之“宝卷”当为经藏。《南齐书·东昏侯本纪》云“东昏侯宝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贤,高宗辅政后改焉。”^⑤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萧鸾担任辅政,具备问鼎皇权的实力之后,将作为继承人的次子萧明贤改名为“宝卷”,“宝卷”一词无疑蕴含着特殊用意。^⑥

问题就在于,萧鸾和萧宝卷到底是受佛教影响,还是道教影响,才取了“宝卷”和“智藏”这样的名字?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萧鸾、萧宝卷父子的宗教信仰入手,考察萧鸾为萧明贤改名萧宝卷的本意。根据历史记载,萧宝卷不学无术,荒淫无道,没有显著的佛教信仰,反倒是道教信仰浓厚,因此“宝卷”之名应该是萧鸾出于道教信仰寄予的愿望。

二、萧鸾的信仰与灵宝斋法

萧鸾(452-498),即齐明帝,南朝齐的第五任皇帝(494-498)。齐高帝萧道成侄子,始安贞王萧道生的次子,齐武帝萧赜堂弟。齐武帝时期,入朝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右卫将军,受遗诏辅政,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政治对手。在萧子良与皇太孙萧昭业的政争中,因为辅政有功,位极人臣。连续废杀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自立为帝。据《南齐书·明帝本纪》记载:

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小讳玄度。^⑦

萧鸾的小名为“玄度”。玄度一词有多义,汉刘向《列仙传·关令尹赞》:“尹喜抱关,含德为

① 《南史》卷四四“明帝诸子”,第1119页。

②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页。

③ 沈约《佛记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三十,中华书局,1958年,第3125页。

④ 《梁书》卷五五“豫章王萧综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23、824页。按:梁武帝萧衍诸子为统、综、纲、绩、续、纶、绎等。萧综改名“萧赞”,明显是为了跟萧衍家族划清界限,回归萧宝卷一门。

⑤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第97页。

⑥ 萧鸾共有十一子,四子、七子早亡,存活九人。其为诸子起名、改名的动因已经难以穷究,笔者以为当与南朝流行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如长子宝义字智勇,三子宝玄字智深,五子宝源字智渊,十一子宝贞字智正,名、字语义关联。其余诸子取名极有可能来自于南齐的郊庙歌词。如六子萧宝夤字智亮,当取自南郊歌词《肃咸之乐》之“夤承宝命”一语“夤亮”为恭敬信奉之意,南朝齐王俭《褚渊碑文》有“自非坦怀至公,永监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夤亮二代者哉”一段。八子萧宝融字智昭,当取自《休成之乐》“纁县敷畅,钟石昭融”一语,《嘉祚之乐》也有“宝瑞昭神图,灵贶流瑞液”一语。九子萧宝攸字智宣,当取自《雩祭歌辞·世祖武皇帝》之“七德攸宣,九畴咸叙”一语。如果上述判断可信,那么萧宝玄字智深,当取自送神歌词《黑帝歌》之“白日短,玄夜深”一语。参见《南齐书》卷十一“乐志”,第168、169、170、176页。因此,可以认为萧鸾诸子取名具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唯独萧宝卷的改名比较特殊。

⑦ 《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第83页。

务，挹漱日华，仰玩玄度。”^①可见道教中的“玄度”指月亮。

萧鸾登基以后，一反齐武帝和萧子良时期的奢靡之风，大力倡导节俭，建武二年（495）冬十月癸卯下诏曰“永览玄风，兢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复古移民。”^②所谓“玄风”，就是清静之风，这里当为道家清静无为的教化之风，表明萧鸾“治国理政”采取道家思想，改变了齐武帝和萧子良家族奉行的佛教传统。^③《南齐书·明帝本纪》记载：

性猜忌多虑，故亟行诛戮。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覡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会崩，事寢。^④

齐明帝萧鸾的皇位是篡位所得，即位时竟然不郊祀天地，在位期间性情多疑多虑，将萧道成、萧贲子孙几乎屠戮殆尽。既不尊重儒教传统、又排斥佛教的萧鸾，或因杀戮太过，晚年病重时，迷信道教与厌胜之术，将所有的服装都改为红色。“巫覡”认为后湖水经过宫内，导致萧鸾得病重，萧鸾不顾劝阻，冒着太官无水成炊的困难，执意阻塞湖水。此外，萧鸾生病期间，还特地地下诏向官府征求白鱼以为药剂，外界才知道萧鸾患病。^⑤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萧鸾的信仰世界是由道教构筑起来的。

六朝时期的道教，经过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不断改革，已经由原始道教改造为贵族道教，但以巫术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并未完全退出贵族的生活，原始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陶弘景在茅山弘扬以清修成仙为主要目的的道教上清教法时，以杀牲血食、弦歌鼓舞为主要特征的民间巫教和与之接近的道教灵宝斋法颇为流行。^⑥民间巫教的庙宇和宗教仪式主要由女巫主持，萧鸾相信巫覡所言，可见当时的宫廷中有民间巫教的传播。贵族道教兴起之后，符篆派记述的斋醮和法术，仍有不少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道士通过章表、赞颂、祭拜、歌舞、符咒等形式，占卜吉凶，预测祸福，代人向神首过请罪，作法驱鬼，招魂治病。^⑦这些道教形式的斋醮活动和法术，在南朝宫廷中普遍存在，特别是齐萧鸾、萧宝卷父子，热衷此道。萧宝卷父子倚重的厌胜之术，就是道教从巫术中继承来的，使用符篆招神劾鬼。符是用红笔画在桃木板上，后来逐渐改为画在绢帛、纸张之上。

萧鸾尚赤的原因，可能跟当时流行的灵宝斋法的教义和经卷有关。从萧鸾的表现来看，尽管他跟陶弘景有交往，但其最感兴趣的应该是能够祈福禳灾的灵宝斋法，而不是神仙下凡之类。《灵宝经》是晋代由丹阳葛氏家族传播的一组道经，乃晋末葛洪从孙葛巢甫所造，主要有《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等，经过刘宋道士徐灵期和同时的陆修静的传播，灵宝教法颇为流行。后来问世的《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是灵宝诸经中最重要的经文，《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则是对前者的解说和施用方法。所谓“赤书”就是红色的篆文符咒文字，即《灵宝经》所说的由五帝（五老）掌录的“天文”，法力无穷，能招魂摄鬼，降魔除妖，

① 旧题刘向撰《列仙传》，《列仙传》《神仙传》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

② 《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第88页。

③ 李猛《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对齐武帝萧贲、文惠太子萧长懋以及萧子良家族的佛教信仰和弘法活动有详细的考察。

④ 《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第92页。

⑤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以为，白鱼乃“文簿中白鱼”，即蠹书鱼。这个说法在《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中可以得以证实。《资治通鉴》卷一四一“齐纪”“明帝永泰元年（498）”，第14册，第4571页。

⑥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第四章“东晋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⑦ 朱越利《道经总论》第一章“道经之源”第三节“吸收巫术、鬼神观念和自然崇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20页。

禳灾祛病，助人成仙。^① 陈国符《道教源流考》认为，在《灵宝经》中，收录在《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中的《真文赤书》是陆修静最为重视的，也就是《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中的《五篇真文》，“其功效与符同，皆所以劾召鬼神”。^② 由此看来，萧鸾“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就是想利用赤色在道教中的神秘法力制服具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妖魔鬼怪，乃至敌手。^③

对南朝道教改革和形成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天师道代表人物陆修静，一个是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齐高帝萧道成发动兵变，取代宋后废帝刘昱的宋升明元年（477），陆修静死，陶弘景二十二岁，这期间担任南齐诸王的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萧鸾和后来的梁武帝萧衍的道教信仰，应该是跟陶弘景交往的时候奠定的。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齐武帝萧赜崩，萧鸾受命辅佐萧昭业，陶弘景三十八岁，这一年，萧鸾给萧宝卷改名。那么萧鸾受陶弘景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但作为道教改革的先行者，陆修静教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记载：

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篆。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④

陆修静长期在南朝的统治核心地带金陵弘传天师道，影响主要在宋齐两代，门徒众多，而且道宣很清楚地指出，陆修静的改革“意在王者尊奉”，受到宋明帝等帝王的推崇。道风沐浴之下，萧鸾等人受此影响可以想见。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南朝陈马枢《道学传》的记载，萧鸾的政治对手萧子良极端排斥灵宝斋法，看到《灵宝经》一部就掷在地上，这说明萧子良集团和萧鸾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渗透到了宗教信仰领域，萧鸾斥佛，萧子良排斥道教灵宝斋法，这正好作为本文上述研判的佐证，说明萧鸾宫廷敬奉道教灵宝派。马枢《道学传》记载，萧子良扔掉《灵宝经》之后，“少日便手发疽疮，痛楚特甚，遂遣冯先生首谢。先生为作悔辞，备加嫌疑，虽蒙少差，终为此疾而亡也。”^⑤ 这当然是道教徒护教之辞，但可以看出在萧齐皇族之中，佛教和道教信仰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也说明道教灵宝斋法在萧齐宫廷中的风行。这里提到的“悔辞”一说值得注意，虽然信仰佛教的萧子良是否可能向道教徒忏悔存疑，但这说明南朝齐梁宫廷的忏悔首过风气在佛教和道教中均流行。

三、萧宝卷的教育水平及信仰

《南齐书·东昏侯本纪》记载“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高宗亦不以为非，但助以家人之行。……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⑥ 显然这是一个不学无术、行为荒诞不经的荒淫皇帝，其教育水平可想而知，其宗教信仰也必然是毫无系统可言，与其父萧鸾一样，更容易接受的是道教厌胜、符咒之术。据《南齐书》本传记载，后宫失火之后，萧宝卷“更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雕梁画栋，穷奢极欲。^⑦ 仙华、神仙和玉寿三个宫殿的命名，显然来自道教。玉寿，是

① 以上论述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第四章“东晋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之“《灵宝经》的制作及其道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138页。

②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之“灵宝经考证”，中华书局，2014年，第55、56页。

③ 也有观点认为，道教尚赤可能跟道教重视丹砂有关，可备一说。但若以此来解释萧鸾尚赤，缺乏直接证据。参詹石窗主编《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四辑《大道修真》卷四，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204-205页。

④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弘明集》《广弘明集》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⑤ （陈）马枢《道学传》，参见陈国符《道学传集佚》，载《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第189、433页。

⑥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102页。

⑦ 同上，104页。

道教神仙世界中的仙山,《云笈七籤》卷八“圆华者,黄老之宫名也;玉寿者,太微天中之山名也。”^①此外,永元三年(501),萧宝卷改阅武堂为芳乐苑,“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褻之像”。^②紫阁一般是仙人或隐士所居之处,晋陆云《喜霁赋》:“改望舒之离毕兮,曜六龙于紫阁。”^③萧宝卷在紫阁上图画的“男女私褻之像”,当也属于道教房中术一类的春宫图。

萧宝卷的信仰世界非常奇特,在寺院林立的建康钟山(又名蒋山),他对佛教没有情感,而是尊奉建康本土神灵蒋山神,多次大加封赏“信鬼神,崔慧景事时,拜蒋子文神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萧衍起兵攻至建康城下,萧宝卷又尊蒋子文为灵帝,命巫师祭祀“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后堂,使所亲巫朱光尚祷祀祈福。”萧宝卷和他的父亲萧鸾一样,在兵临城下之时,寄希望于厌胜之术“时城中实甲犹七万人,东昏素好军陈,与黄门、刀敕及宫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诈作被创势,使人以板擗去,用为厌胜。”^④

萧宝卷信仰道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如何呢?萧宝卷为宠妃潘玉儿(潘玉奴)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为了装饰殿宇,肆意剥取佛寺装饰“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⑤甚至屠戮僧人:“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麀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⑥对佛教采取的是极端仇视态度,所以汤用彤说“东昏所为,当亦因其信道教。”^⑦

萧宝卷喜好打猎,设立多处“射雉场”,“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縗,百品千条,无复穷已。”^⑧这些都是用鸟毛制成的衣物,雉头即雉头裘,是用雉头上的毛制成的裘衣,跟狐腋一样珍贵。《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⑨《洛阳伽蓝记》卷四“开善寺”记后魏河间王元琛对别人说“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⑩“鹤氅”见于《晋书·王恭传》,说他“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⑪“白鹭縗”则是一种头巾,即接籬,又名睫木。雉头裘、鹤氅、白鹭縗这种服装属于当时的奇装异服和奢侈品,这种用羽毛制作的服装常作为道教神仙的象征。

因此说,教育水平比较低的萧宝卷,和他的父亲萧鸾一样,佞信道教,学习和模仿了一些道教神仙之术的皮毛之外,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巫祝色彩浓厚的符咒、厌胜之术,只不过他把蒋子文这尊“大神”捧到了很高的地位,有比较明显的原始道教的色彩。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萧宝卷的取名渊源自道教,“宝卷”指以符咒、压胜为主要功能的原始道教和道教灵宝斋法经籍。

① (唐)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八,李永晟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137页。

②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中华书局,104页。

③ 陆云《喜霁赋》,(明)张溥编,(清)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和帝中兴元年”,第14册,第4651页。

⑤ 《南史》卷五《齐本纪》,第153-154页。

⑥ 同上,第153页。

⑦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⑧ 《南史》卷五“齐本纪”,第154页。按:南朝齐皇室喜好射雉,齐武帝萧赜永明初期通过射雉的方式讲武练兵,选拔将才,永明后期因为崇信佛教进而“断杀”的氛围下,在萧子良的多次谏议下最终下敕放弃射雉活动。萧宝卷酷好射雉,恢复了这一传统,而且将其纳入道教信仰范畴之内,无疑是一次大的转变。关于齐武帝射雉和萧子良的谏议,可参李猛:《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第一章“齐武帝萧赜永明中后期对佛教的整顿”第25、26页,第二章“从‘御膳不宰牲’到‘不用牲祭’:齐武帝‘断杀’考论”第29、37、38页。

⑨ 《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69页。

⑩ 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法云寺”附“开善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07页。

⑪ 《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第2186-2187页。

四、魏晋六朝佛、道经典图籍的形制与“宝卷”的再认识

佛典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主要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受到古代印度梵夹装贝叶经的影响，早期的汉译佛经也有纸本梵夹装，但并不占主流。梁陈间的著名僧人僧祐在《出三藏记集》记载“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史苍颉在于中夏。”^①这个造书祖师的长次之分当然是僧徒的观念，不过“梵”所造书的形制，应该是魏晋六朝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梵文梵夹装。唐代杜宝《大业杂记》记载“其所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书，书即今胡书体。贝多叶长一尺五六寸，阔五寸许，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怙怙然，今呼为‘梵夹’。”^②《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夏四月“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胡三省注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③“佉楼”当即“佉卢”，根据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的说法，“佉卢字来源于古波斯拉美文字，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3世纪又传入鄯善地区。”“佉卢字书写的文献材质最常用的是木牍，其次是纸和绢。”^④另外，出土的古西域文字古籍，诸如焉耆—龟兹文古籍主要材质是纸本和木牍，粟特文古籍主要是纸质抄本和一些木牍、羊皮书，于阗文古籍是梵夹装和卷轴装，其中卷轴装往往是汉文和于阗文合璧。^⑤这些西域文字古籍中相当一部分是佛经，其形制主要是梵夹装和卷轴装，而且卷轴装是受到汉文化的明显影响。另外，佛经的装帧形式还有经折装、粘叶装、缝绩装、旋风装、方册装等，均出现在唐五代以后。^⑥总体而言，魏晋六朝时期的佛经装帧主体形制是卷轴装，兼有传入的梵本和西域文字梵夹装，以及受此影响产生的汉译梵夹装佛典。就如此丰富多样的装帧形式而言，用“宝卷”一词指称佛教经籍，显然是缺乏囊括力。

与佛经装帧形式相较，魏晋六朝的道经形制比较单一。道经因为是本土所造经典，因此采取魏晋南北朝通行的主流装帧方式——卷轴装，这一点不同于佛教。道教的经典经常被称为“玉经”“真经”“宝经”，号称是天宫所降，是纯粹的本土信仰的产物。南朝宋明帝太始七年（471），陆修静上《三洞经书目》，云“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⑦这个“天宫所降”的道经，在三教论衡激烈的魏晋六朝，自然不会用梵夹装这种外来的属于佛教的装帧，根据卷数记载显然是卷轴装，外加一些古奥难识的篆书“神符”，自神其教。《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即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⑧《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是早期民间道教太平道的核心经典，《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为一百七十卷，其形制为缥白素、朱介（界）、青首、朱目，即书写在青白色的生绢上，红

①（南朝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苏晋仁、萧鍊子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②（唐）杜宝《大业杂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大业杂记》合刊，中华书局，2020年，第193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懿宗咸通三年”，第25册，第8325页。

④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之“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古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第6页。

⑤同上，第6—9页。

⑥李际宁《佛经版本》之“佛典装帧”，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40页。

⑦（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校注》卷五五“破邪篇·妄传邪教第三”，周叔迦、苏晋仁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4册，1663页。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之“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第89页。

⑧《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中华书局，1965年，1084页。

色界栏，青色卷首题签，经目是红色字体，卷轴装。这是比较早的记载道经形制的资料，而且我们所能掌握的早期道经的形制，也是卷轴装。

明王源静补注《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对宝卷进行释义，明确说“宝卷者，宝者法宝，卷乃经卷。”^①车锡伦对各个时期的宝卷的不同异称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归纳了一些特殊的宝卷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宝卷，如受到道教、佛教影响而形成的民间宗教教派的“科仪”“宝忏”“科”，部分民间宗教将自家的宝卷直接称为“经”“真经”“妙经”“宝经”，用于神道人物传说和宗教祖师传记的“宝传”“传”等。^②车先生研究的对象是元明以下属于俗文学和民间宗教经卷范畴内的宝卷，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宝卷。但我们仔细分析和对比这些宝卷的异称，发现其在六朝时期的道教经典中悉数出现了，而且高度吻合。所以信奉道教的齐明帝萧鸾，给东昏侯起名“宝卷”，一定是受到道教经典名称的启发，而且这也是“宝卷”一词的早期含义。考虑到现存较早的宝卷即为科仪类，结合萧鸾、萧宝卷父子的道教信仰，以及泽田瑞穗、刘祯和圣凯等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早期宝卷的含义，即指佛教和道教的符咒、经忏、科仪类经卷，此类经卷乃中土所造，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卷轴装形制。

东昏侯失德，使得宝卷作为宗教经卷的名称，显得颇为不恰当。六朝故事，一直是唐代史臣和帝王以史为鉴的重要参照对象，唐代编纂八史，对东昏侯之类的荒淫昏聩帝王有深刻的批评。前文引述的唐代李延寿在《南史》中对萧宝卷的批评即为典型。但是，宝卷作为中土所造道教、佛教经忏类经卷的总称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段时期是宝卷文献的孕育发展时期，从萧宝卷之后到南宋这几百年，“宝卷”一词没有被普遍使用而已，直到萧宝卷造成的历史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化，人们才重拾“宝卷”一词，作为此类文献的总称。这正好可以解决车锡伦先生所说的“宝卷的产生，从历史文献中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的问题。实质上，宝卷在历史文献中一直是存在的，其源头就是佛教、道教的经忏类文献，此类文献因为是中土所造，所以被称为“宝卷”，这类文献名称的发明权，应该归功于萧鸾、萧宝卷父子。

（责任编辑：于光）

① 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9年，第773页。

② 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章“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第28、29页。